

WEN HUA QIAN MO

文化阡陌

王新民\著



■中国上世纪后二十多年的文学，除一批文化精英所创作的精品力作外，大多都是思想解放的武器，成了“革命卫生学”的工具，本世纪这几年的文学，大多都在玩庸俗，玩青春，玩泛爱，玩性，玩“小资”，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学变成了玩具，变成了“不革命不卫生”的桑拿场所。



 黄鹤文丛

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文化阡陌

王新民 \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 中国上世纪后二十多年的文学，除一批文化精英所创作的精品力作外，大多都是思想解放的武器，成了『革命卫生学』的工具，本世纪这几年的文学，大多都在玩庸俗，玩青春，玩泛爱，玩性，玩『小资』，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学变成了玩具，变成了『不革命不卫生』的桑拿场所。



黄鹤文丛

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出版物数据中心 (CIP 数据)

黄鹤文丛系列 (1-20) / 王新民主编.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2007.8

ISBN 7-89995-002-3

I. 黄… II. 王… III. 文艺-文学

黄鹤文丛系列——文化阡陌

作 者: 王新民

出 版: 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2 号 (国家广电总局院内)

邮政编码: 100866

责任编辑: 谢仲平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作: 海桥广告·幻境文化

印 刷: 武汉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40

字 数: 68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9995-002-3

定 价: 28.00 元/册 (全套 560.00 元)



作者简介

王新民，笔名斯民，大专毕业。1952年10月出生
于湖北省武昌县大桥乡。当过农民、工人、机关文
书、报社文艺编辑。曾任武汉市江夏区文体局副局
长，武汉市青年作家协会秘书长，省、市青年联合
会委员。近三十年来，先后在国内外120余家报刊
发表诗歌、散文、随笔、文艺评论等体裁的文学
作品1300余篇（首），约300万字。其作品曾十
余次获奖，有20余篇（首）作品被收入多种版
本的选集或译介国外，并有20余家报刊、电台、
电视台对其作品进行过专题评介，武汉出版社还
出版了评介王新民作品的专著《王新民论》。其
创作实绩分别列入《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
新诗大辞典》等文艺辞典。系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湖北省作家协会理事，诗歌创作委员会副
主任。现任武汉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武汉作
家》总编辑。

目 录

1	也谈余秋雨
5	还张爱玲本来面目
8	易中天的大俗大雅
11	解读陈应松
15	中国需要精英文化
18	文人不是商人
20	坚守纯文学的“纯”度
23	文艺批评之批评
25	文学读者哪里去了？
28	市场经济与文学
31	孤独寂寞的文人
33	走进黄昏的“青春文学”
37	值得关注的物欲化、肉欲化倾向
39	畅销书随想

43	聊聊“无聊”
47	谈崇高
50	城市之夜
52	尘世走笔（五章）
55	一个好人走了
58	漂流桃花溪
60	在赵瑞泰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62	在《红尘》作品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64	人生与文学的碎片
69	光彩夺目的“黄陂文艺现象”
76	古韵今音歌神州 ——读《张代重诗词选》
82	当代的心灵关怀 ——读《殷增涛诗选》
85	《联语哲思》序
92	《长江万里行图》序
95	《七个春天》序
107	论田禾乡土诗的痛苦意识
117	多元化的诗歌时代
121	现代派诗的基本文化特征 ——在江汉大学《海天涯》诗社成立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26	先锋诗歌与民族文化
132	诗歌应当关注现实

135	当代诗歌形式的困惑
138	重建诗歌边疆
141	诗坛，不应丧失理性
147	现实主义诗歌与现代主义诗歌碰撞之后
150	诗歌呼唤时代精神
153	诗人、诗歌与时代
157	诗人与艺术良知
160	诗人与诗

附 录

191	追寻诗的风骨与灵魂 ——论王新民诗论 / 鲍风
205	一个诗人的“沉默” / 李鲁平

也谈余秋雨

去年年初至今，香港凤凰卫视开辟了一个《秋雨时分》专栏，每当打开这个专栏，便听到余秋雨说：“在文化面前，没有人可以当老师。”最近，中央电视台举办青年歌手大奖赛，请余秋雨当评委，一个简单的文化题，他却在那儿唠唠叨叨地点评个没完。这二件事虽然很小，但我感到像吃了两只苍蝇一样难受。难怪几个文友发难余秋雨：你余秋雨说，在文化面前，没有人可以当老师，而你却在凤凰卫视的十几亿观众面前充当老师，在中央电视台的十几亿观众面前充当老师，这就是说在文化面前，唯有你余秋雨可以当老师。

近几年来，余秋雨先生凭着几本小册子给他带来的好运，先后曾赴海内外大学和学术机构讲学，并参入新闻和电视文化的传播，影响日益之大，成为当前新闻界和文化界的沸点人物，媒体以“文化大师”冠之以他，使他近乎于自我膨胀、飘飘然于天下，他亦频频作秀电视，成为电视明星，他天马行空，到处为大众点津解惑，俨然一副宗师模样。

其实，余秋雨从《文化苦旅》的苦情、失落、凭吊到“千禧之旅”、“欧洲之旅”的矫情、做作；从流行的“文化散文”的写

作模式转到“谈心谈理”、“做人为人”的写作模式，给人的印象是其内功修炼不足，内贮太少，只博得一个“媚俗”的头彩。他所提倡的“建全文化人格”，实际上是从他自己开始实验的。他从《文化苦旅》谈山谈水，《山居笔记》谈史谈鉴，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已沦落到谈庸俗的人和人的庸俗，一个自称“什么课都可以教，唯有人生的课不能教”的教授实际上在讲大家都知道的很普通、很虚假的人生“哲学”。面对余秋雨，有位资深的评论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一个没有大师的英雄时代，小丑在唱主角，在我们断裂的文化伤口上撒盐。”

平心而论，在余秋雨先生出道的头几年，我还是傻乎乎地喜欢过余秋雨。他的散文作品确实有其明显的个性所在，确实有突出的过人之处。譬如，他善于在极其开阔的历史时空中，发觉审视处于遮蔽状态的种种文化现象，从而使笔下所言独步新境；他注重抓住民族历史上个体乃至群体人格中的悲剧因素，展开多维多向的关照，体认与阐释，以此赋予文本直逼灵魂、撼动魂魄的精神力量；他自觉以“小我”为前台，但又不忘却“大我”作背景，并能够将“小我”与“大我”加以有机融会整合，营造出既充盈主题喧响，又不乏社会厚度的审美旷域；他坚持将激情和想象注入艺术宣叙，让情思挟裹着识见遨游，借此幻化并建设着理性王国。

但后来我又为什么不喜欢余秋雨了呢？余秋雨的文章读多了，余秋雨越来越走红了，我突然意识到余秋雨并不是那么可敬。不可敬之一，首先是文风和态度的霸道。在他的讲话和作品中，他常常以权威之居，摆花架子，较虚劲。比如在《道士塔》这篇散文中，他说要找个地方坐下来，跟别人比比学问高低，可真要探

讨学问，他却马上溜得无影无踪。这一点余秋雨在《上海人》这篇散文中更有清楚的表白，他说，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他认定，学术界的所谓“南北之争”，大多是北方人假想的。这等于说，我说了就是，你不要来跟我争论，来，我也不理你，态度既傲慢又滑头。他常常批评别人，比如在《夜雨诗意》这篇作品中，他说，那些批评以黄土文化背景的艺术作品的人，“无论在生命意识还是在审美意识上，他们都是弱者。”他不理会别人的批评，批评别人的时候却说别人是弱者。更为霸道的是，他在《余秋雨敬告全国读者》这篇文章中，把自我崇拜和对批评家的妖魔化发展到极致，他宣称自己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原动力。批评他的批评家和媒体全是盗版集团雇佣的文化杀手，俨然一幅“文化教父”的姿态。此外，余秋雨在“文革”十年中，曾组织了上海的十一个“才子”，化名为石一歌与北京的“梁效”共同主宰着中国文化的理论批评前沿，并主编过《朝霞》这一极左的文学刊物，“四人帮”事败之后，余秋雨这个机灵的才子却像泥鳅似的溜掉了。当现在有人批评他这段极不光彩的历史时，他却无视历史，要尽狡辩之能事，从不认罪，从不忏悔。

不可敬之二，首先是余秋雨除了几篇真还算不错的散文以外，其它的散文几乎千篇一律，大多都是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的混合物，而这两种思潮又是已被人们唾弃了的。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曾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散文中风行一时。除了鲁迅等少数作家外，现代文学中的散文作家几乎都受过感伤主义的影响，而伪浪漫主义在1949年后的中国文坛更是大行其道，几乎成了唯一的一种散文风格。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当代散文已逐渐摆脱了

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的影响，走向了多元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余秋雨充满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色彩的散文，显然是一种返祖现象。其次，是余秋雨散文的调子很高亢，高亢到让人觉得好象他在吊嗓子。此外，余秋雨常常在散文中，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哲人，背着手，低着头，皱着眉在慢慢踱步。其基调永远是具有学术权威口吻的居高临下。

不管怎么说，余秋雨还是很有才华很有学问的，可能他读的书写的书比我们都多。但可惜，他写的文章没有太多我所要的东西，他的人品却更不值得恭维。

2007年5月18日

还张爱玲本来面目

保守地说，当今中国，至少有近百万铁杆张迷。在这股巨大的“张爱玲热”的冲击下，我也被溅了一身水，读了十几年张爱玲。这说明张爱玲的作品是具有极大的感召力的。

张爱玲的作品穿越时空的隧道，赢得了当代人的青睐，其主要原因在于，她的作品与当代人生活与感情发生呼应甚至产生共鸣。随之而来的是，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有些学者和评论家甚至断言张爱玲是除鲁迅之外最伟大的作家。这么说，一部现代文学史似乎只为了两个作家，在“五四”和三十年代站立的是鲁迅，在四十年代站立的是张爱玲。如果真是这样，张爱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又是什么呢？

我无意否认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从个人的欣赏情趣而言，也曾深深地被她的作品所吸引，甚至陶醉于她所营造的艺术世界里。然而，当我读了柯灵老先生的《遥寄张爱玲》、于青先生的《张爱玲传略》和李惠敏先生的《国难当头时卿卿我我的一族》等大著后，我的情感被推向了一个两难境地，我反复问自己：你到底还喜不喜欢张爱玲？

张爱玲成名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抗战时期，当

时代高呼“救亡”，急需张扬民族激情和民族精神的时候，我们没有要求张爱玲拿起枪来去抗日，我们也不排斥张爱玲笔下“饮食男女”的普遍人性的存在与合理；从维护个人情感自由的角度，我们也可以不对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之间的“倾城之恋”说三道四，因为那毕竟是他们的个人私事，外人不便干涉，可即便退一万步，张爱玲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她不可能完全摆脱社会对她的制约；置身于当时的时代，她也可以冷眼旁观时代风雨演变。但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文学正需要张扬个性中的民族性的时候，张爱玲却在作品中沉迷于对“食色”这些人的自然属性的描绘与表现。她的作品在那个时代表现男欢女爱，虽然也赢得了读者的眼泪、叹息和微笑，但我们不禁要问，面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你张爱玲看见了没有？

当进步文学在沦陷区无法生存立足，汉奸文学又遭人摒弃没有市场，张爱玲的这种表现“食色”的作品正可以在这种政治的夹缝中畅通无阻、大行其道。然而，当张爱玲一夜间红遍上海滩时，我们却看到了她绚烂背后的隐忧。她的作品躲避了对于时代大潮的描绘，因而之后被时代所冷漠甚至遗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抗战爆发之时，“末代诗人”陈三立以自己的老朽身躯，做出了令世人敬重的豪杰之事，即用绝食自杀来表达自己对日寇入侵的抗争与愤怒。他没有留下《给战斗者》似的战斗诗篇，但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首战斗的诗。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身体写作”。此时此刻，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张爱玲时，她又是如何参与历史的创造的呢？她所做的，是出入大汉奸周佛海的公馆，且与汪精卫政权中心的红人胡兰成打得火热。我们不禁要问：你张爱玲对汪伪宣传部次长胡兰成做汉奸是怎么看的？对汪精卫汉奸卖

国组织是怎么看的？难道你没有看见和听到日寇奸淫烧杀的暴行？难道在侵略者的“封闭”状态下，你只看到了孤男寡女在电车上跃动的情欲？你是不是也太超然了吧？

摆脱历史的拘束与限制，张爱玲的作品以其对于人性的深入开掘，以及对于男女情爱的透彻洞察赢得时下读者、特别是中青年读者的青睐，甚至成为“小资们”的必读书，从读者心理而言，在当代消费文化时代，读者阅读文学作品主要是一种消费行为，是消遣、休闲、愉悦，而张爱玲作品的“软性”特征正好迎合时下读者的心理需要。现在的张迷比昔日张爱玲在上海滩所拥有的读者之所以要多成千上万倍，这就不难理解了。再说，美丽的女人加上才华，真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因为张爱玲的美丽和才华，读者本能地原谅了她不太光彩的过去，甚至原谅了她的劣痕。然而，文学作品和文学史是一门学科，理应有客观、严谨的科学态度，切要尽可能地排除个人主观好恶。对于当代的“张爱玲热”，我们似乎要在“热”中保持几分冷静，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给张爱玲以客观公允的地位与评价。因为在张爱玲时代，毕竟有大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卑微地活着，而是用血与生命书写着民族的魂魄。

2002年8月3日

易中天的大俗大雅

自易中天在《百家讲坛》“品读三国”以来，受到了观众的热烈追捧，掀起了收视的热浪，也成为人们街头巷尾和高楼深院议论的话题之一，其人气如此之旺，影响如此之深远，在央视《百家讲坛》的历史上，恐怕还是头一次。

不仅如此，几家出版社几乎同时推出的易中天几部著作也卖得出奇的好，总销量超过百万本，使易中天一夜走红并且暴富。

易中天深谙观众和读者的心理需求，他知道今天的受众关注历史，主要就是关注人、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命运、前途和活法。“否则，早已作古的人，关他们什么事？”所以，易中天坚持把英雄人物还原成普通人，还原成和当代人一样的有着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而且也会犯错误的人。这就拉近了历史和当代人之间的距离，观众和读者就不会觉得历史人物和历史时间“事不关己”。易中天运用现代语言、现代视觉和平民立场，和受众平起平坐一起“品读三国”，也就从形态和内容上达到了大俗大雅的最佳效果。

易中天大俗大雅“品读三国”，第一个成功的秘笈是定位准确。他在《帝国的惆怅》一书的“跋”中曾说：“历史总是让人

惦记，也不能不让人惦记。”他认为，历史是有用的，也是有趣的，于是就有了对历史的多种说法。而最常规的是“正说”，最流行的是“戏说”，“正说”难懂而且乏味，“戏说”好看又有趣。真实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实。这就产生矛盾。他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趣说”。所谓“趣说”，就是将历史放在其里，将文学放在其表，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思想和趣味。易中天的演讲风格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境界：一种境界是“正说”。“正说”也就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不胡说，不瞎说，保持一种严肃的治学态度；第二种境界是“趣说”。“趣说”即在坚持真实的基础上强调表达方式的大俗大雅，以求最大限度地调动观众的听讲兴趣；第三种境界是“妙说”，“妙说”也就是在前两说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分析，给观众以启迪，这是最高境界。

易中天大俗大雅“品读三国”，第二个成功的秘笈是靠他深厚的学养。易中天是学古典文学的，后来又广泛涉猎美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学科，但他做学问却从来不拘泥于“学术”，而是自称信奉“流氓主义”，随信之所至，到处乱窜。这使得他在文史哲等各领域长袖善舞、游刃有余。因此，尽管他的讲座中有一般学术讲座所忌讳的插科打诨，搞笑语言，但观众并不觉其浅薄，反而认为他的讲座别开生面，让听众的知识面得到了拓宽，并且称赞他的讲座是一场“听觉的盛宴”。

易中天大俗大雅“品读三国”，第三个成功的秘笈是善于运用悬念。对于一个以讲解为主的节目，要观众认同是一个极高的要求。但易中天做到了，就像他在《帝国的惆怅》一书的开篇《晁错之死》，开头一句“晁错是穿着上朝的衣服被杀死在刑场的”，开篇就让人惊心动魄并回味无穷！听众止不住要问为何在

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晁错就被匆匆押赴刑场？他设置了一个悬念，然后笔锋一转，切入问题的要害，引出当时的一大政治事件，也是对其后漫长中国历史起了重要作用的事件，即“削藩”。他的讲座就是这样悬念环环相扣，诱引听众进入他讲座的“迷宫”，使之体味再三，意犹未尽。

易中天大俗大雅“品读三国”，第四个成功秘笈是讲课方式幽默风趣。他在讲座中常常运用充满现代语言的俏皮话，如：“刘备在多年在征战中风餐露宿，得个风湿性关节炎啦，那倒也是可能的。”“诸葛亮一看，管他呢，把城门一开，抱着自己的琴上城楼卡拉OK去了……”“刘备对诸葛亮的好，好到让关羽和张飞觉得，就像老鼠爱大米。”等等等等。据说，有“易粉”甚至专门收集诸如此类别具一格的句子，为易中天“品读三国”，编了一本妙语录。

近十多年来，随着电视和网络媒体的渐显强势，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选择与价值取向上，经历了一个从“高雅”即追求精英文化，逐渐走向了“大俗”即张扬草根需求，顺从大众品位的过程。易中天“品读三国”，应该说是在学术上大俗大雅地走近大众，并且取得了成功的典范，无论学术界对此作何评论，但事实已经证明，大俗大雅似乎也是一个学者用心追求并且可能抵达学术目标的一种最高智慧。

2006年6月6日